

痛感与共识：创伤共通感的跨文化连接理路 及传播实践

——基于生态创伤影像的分析与反思

王鑫 黄皓宇

摘要：从工业革命时代笼罩曼彻斯特全城的连绵酸雨，到自发行以来就激起全球动物保护声浪的生态纪录片《海豚湾》，人类对自然造成的生态创伤及其带来的惨痛后果不仅在跨文化、跨时代与跨媒介的作品中被反复表征，也经由共同体间共通的“痛感”与“创伤”构建了“如何与自然共处”的经验共识及情感联结，实现由特定生态创伤向普遍文化创伤的转换。其中，作为情感中介的生态创伤影像何以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中，建构异质文明间的共情理解与意义桥接，为人类沟通提供更多共识的可能？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提示，研究从共通感与创伤记忆的思想谱系出发，搭建“创伤-痛感-共识”的理论框架，并通过对相关纪录片的创作者访谈与视听分析，廓清“创伤文本”实现跨文化理解的创作路径与连接可能，以及何以促成由生命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认同。

关键词：痛感；共识；跨文化传播；文化创伤；生命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3)04-0082-09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22120220300)

一、引言

从席卷全球并引发普遍担忧的全球性热浪，到毁坏道路交通造成数十万人流离失所的特大洪水，愈加频繁的极端天气给不同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物质破坏和精神创痛。人们在反思人与自然的的同时，也认识到：这不是单一国家和族群的困境，而是人类需要直面的共在和共通的问题。以生态危机、恐怖袭击与现代大屠杀为代表的创伤性体验呈现为一种痛感意义上的文化联通，也为跨文化的意义共识提供了可能：跨文化传播的语境构建不仅来自主体实践的具体感悟，也需要“共话伤痛”的情绪反馈。人类既可以在“悦耳悦目”与“悦心惬意”的层面上建立内容与情感上的审美共通，也能基于痛感建立情感连接和价值共识。人类共有的创伤事件与经验痛感为跨文化理解辟出一条交往通路，正如杰弗里·亚历山大所阐述的：“通过文化创伤的构建，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甚至有时是整个文明，不仅能够认识并分辨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及其根源，还能为此担负起一些重大责任。当集体成员认识到创伤的原因，并担负起相应的道德责任时，通过原则上允许他们分担其他人的苦难，集体成员从而界定了他们休戚与共的集体关系。”^[1]

本文着眼于纪录片文本背后的话语及社会互动，通过文本间的对话，辅以对相关纪录片作者的半结构式访谈，考察“创伤-痛感”在跨文化传播中发挥的情感功能与社会效用。笔者于2021年8月对《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王国》的总监制书云导演进行了两次半结构式访谈，她从创作者的角度参与书写、纪录生态创伤的象征化过程，为“创伤-痛感-共识”的情感理路提供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因

此,本文将结合文本分析与创作者访谈,具体探讨:①作为影像媒介的纪录片在拍摄传播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中介化过程中,如何展现生态创伤向生命痛感的转换,进而建立普遍的人类共识?②这种中介化的表征过程如何在跨文化语境中构建传播理路,又如何通过人类共同体普遍的情感共通形成跨文化连接?③生发于具体媒介文本的痛感与创伤如何渗透进全球化的媒介场域,并结合当下平台化的传播特质,促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跨文化实践?

二、生态创伤、文化创伤与作为中介的生态创伤影像

在医学领域,创伤往往被视作一种个体身体与精神层面的威胁,如朱迪思·赫尔曼在《创伤与恢复》中将创伤定义为“通常涉及对生命或身体完整性的威胁,或与暴力和死亡的亲密接触”^[2]。在精神与认知上,这些创伤超出了日常经验的范畴,因为它们压倒了我们的官能,“对基本的人际关系提出了质疑”,并“粉碎了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形成和维持的自我结构”。^[2]将这种个体内部的紧张与威胁拓展至人与自然的互动中,“生态创伤”也由此而来。临床心理学者蒂娜·阿莫鲁克在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将生态创伤划为两个层次,从客观环境上说,生态创伤指由于人类活动或自然灾害造成的环境破坏,并由此使人类族群与既往的生活圈层、生活方式与生活栖息地相分离;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生态创伤源自“这种同土地亲密关系的创伤性丧失”:当人类被强行从他们的家庭、文化和土地中分离出来时,“个人、集体、生态和精神领域的暴力破坏就产生了”。^[3]电影研究者阿尼尔·纳莱恩从历史的向度切入,认为在工业化以来的生态实践中存在着一种旷日持久的生态焦虑:一方面人们意识到生态环境在当下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受到威胁,希望通过采取行动保护自然世界;但另一方面,人们又会刻意回避对生态破坏的了解与报道,压抑保护自然的呼声与需求,以求持续发展全球经济。纳莱恩将这种矛盾且压抑的心态归结于人类对于生态伤害的回避:“我们把生态伤害视为一种创伤,一种公认的、我们努力抑制以避免其痛苦影响的东西。”^[4]换言之,在当下的研究中,“生态创伤”不仅仅是一种物质上的威胁,更与身份与文化认同密切相关。

“生态创伤”也由此与“文化创伤理论”(cultural trauma theory)存在对话空间。在文化创伤理论的视角下,伤痛的来源不仅是生理性与个体性的,更是社会性与群体性的。文化创伤来源于一个共同体“感到他们遭受了可怕的事件,这些事件在他们的群体意识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永远铭刻在他们的记忆中,并以根本不可挽回的方式改变了他们未来的身份”。^[1]虽然事件作为原初性的创伤奇点,在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中被一次次书写,但事件本身却不存在创伤性:“文化创伤诞生于社会的中介性因素。这一过程可以与事件发展同步,也可以在事件发生前,或是作为事后(post-hoc)的重建过程进行。”^[1]所以,文化创伤理论实质上秉承了建构主义的理论取向,强调事件只有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与解释系统中才能被结构为“创伤”。^[5]具体而言,事件的创伤性可以同时波及社会各个场域,审美、法律、科学乃至大众传媒都会在创伤建构的过程中更迭相应的叙事话语,“将个人痛苦转化为集体创伤是文化工作,这一行为取决于演讲、仪式、游行、会议、戏剧、电影和各种故事讲述”^[1]。因此,在大众传媒这一特定的场域,文化创伤转换需要构建出一套特定的创伤话语或创伤叙事。对于“生态创伤”来说,“生态创伤电影”或“生态创伤影像”则是搭载创伤叙事的传播中介。

近年来,愈发严峻的环境问题成为纪录片创作的重要母题,生态创伤已然成为纪录片创作者们格外关注的时代症候。纳莱恩将这类描述人类破坏及自然报复的影片称为“生态创伤电影”(Eco-Trauma Cinema),该类影片多以纪录片的形式,着力呈现“人类对自然环境产生的破坏,或是我们在自然的无情更迭中所背负的痛苦与创伤”。^[4]此外,在其他描述人与自然关系的纪录片中,也可以频繁见到描述生态破坏惨痛后果的相关影像片段或话语叙述,或许可以将其称之为以生态为题的“创伤性影像”。这些生态创伤影像往往在情绪上给予受众一种痛感或悲剧感,进而成为普遍的文化议题。而就内容而言,这类影像作品往往包括三个方面:①讲述遭受自然世界创伤的人们;②描述伤害

环境或物种的人们与社会故事;以及③描述生态灾难的严重后果,通常专注于人类的创伤和生存努力。^[4]本研究试图廓清这类“创伤性影像”在跨文化传播中构建生态共识所建构的情感理路与学理机制,进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生态共同体”提供理论指引。

三、“创伤-痛感-共识”:生态创伤影像跨文化传播的内在理路

无论是开采原油而满目疮痍的亚马孙丛林,还是充斥杀戮与鲜血的日本海豚湾,这些生态创伤影像往往在情绪上给予受众一种痛感或悲剧感。想要理解“生态创伤影像”何以成为联结异质文明的情感通路与话语中介,不仅需要跨文化传播的理论资源,也需要接续上哲学与文学理论的痛感谱系。本部分将结合杰弗里·亚历山大的文化创伤理论,以及康德对于“共通感”的论述,捋清跨文化语境中“创伤-痛感-共识”的转换何以可能,作为“载体、内容与中介”的生态创伤影像又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功用,从而促成跨文化的情感共通与共识构建。

(一) 处境互通与视野交融:作为联结话语的“创伤-痛感”

在杰弗里看来,建构文化创伤的意义在于促成社会共识:“文化创伤让人们开始关注一个新的领域:社会责任与政治行动。”^[6]在这一过程中,对苦难的叙述、对创伤的归因直接影响了共同体对于道德责任的理解,特别是创伤叙事中所重点强调的,集体成员间“唇亡齿寒”的依存关系成为彼此分担痛苦的重要原因。例如,在《水俣病患者及其世界》《水俣世界》等生态创伤纪录片中,作为环境污染受害者的水俣病患者及其在镜头中所展现的病痛创伤,以及市民们与水俣这片土地所形成的依存关系,深刻地揭示了生态创伤之下人类的脆弱性,以及凝聚共同体在走出伤痛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可见,要想将特定文化共同体所共享的创伤叙事转换为更为广泛的文化共识,寻找有效的“联结话语”较为关键。

在这里,创伤所蕴含的“普遍痛感”成为文化创伤得以跨文化传播的“联结话语”,也成为不同文明进行共情理解的情感中介。痛感既具备生理意义,又拥有独特的文化意义。从生理上看,痛感是人类神经系统对外界刺激和伤害的瞬间或者持久的反应,这会使人产生记忆,以此来避免和远离可能性的伤害,也是人类自我保护的一种机制;此外,痛感也具有群体意义和文化意义,人们会基于普遍之痛产生的共通体验,对人类行为中某些可能会产生伤害的行为进行规避和反思,从而形成基于痛感产生的共识。比如,在雅克·贝汉拍摄的纪录片《海洋》中,人类对海洋生物的掠夺和捕猎以及对海洋生态的污染,使海洋生命遭遇到了巨大的创伤,观看者会在讲述者的视觉话语中产生人类共通的疼痛和遗憾,并由此反思和批判人类对环境的戕害行为以及如何保护与人类共生的环境和自然生灵。尽管“人类悲欢并不共通”的相关叙述看似可以反诘痛感共识,然而在共通感的实践层面上,这种普遍的痛感却是始终存在的。正如人类生理痛感的强度虽有差异,但因为痛感带有明显的生理性和本能性,故能成为人类的共同感觉。生理和本能构成的交流共通,对人类而言也有自省和反思的意义——换言之,痛感即使不是逻辑上的全称判断,也具备普遍性的意义,也能形成共享的意义空间。痛感共通,是“将自己放在他人的立场上其实是这样的一种行事方式:将私人 and 感性的诸条件放在括号里,以便立足于一种普遍立场。扩展性的思维方式只有通过一种净化、缩减和抽离的方式才是可能的,而每个其他人的立场在此并非在经验中出现的具体立场,而是一种抽象的和普遍立场,一种能代表每一个人的立场”。^[7]因此,“痛感”实际上为不同文明、不同地域的人群提供了桥接共识的认识论基础,为共同体交流情感,共话伤痛提供了特殊的处境或是机遇。

(二) 生态共识的跨文化构建:生态创伤影像的情感共通

基于创伤与痛感的处境沟通不仅与自身的生命体验息息相关,更强调与他者的视野交融:“作为经验性复杂具体情境,人总是只拥有有限的经验知识。在审美中,经验中的个体鉴赏力往往也受到自身特定文化氛围和历史背景的限制。”“但他必须对自己的判断进行检查,并通过别人的立场对自

己的立场进行补充——或者通过意见交流,或者通过示例性的艺术作品。”^[7]在这里,生态创伤纪录片即是“示例性艺术作品”的代表,通过影像的形式记录特定地区的生态创伤,并得以在跨文化的语境下勾连起相似的痛感语境,从而联结起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生态共识。

跨文化创伤的建构离不开人们共享的经验和意义,也离不开呈携者群体(carrier group)借由大众媒介构建的创伤叙事,他们搭建起人类对于生态创伤普遍的情感共识。^[1]那么,创伤与痛感所蕴含的共识究竟是什么,相关的媒介作品为何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与接受?实际上共同体间的共识有赖于具备共通感的反思实践:“通过主体间性的反思也展示了社会共同体中一种新的时空维度……我和他者通过相互的给予关注和投入情感而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组成一种审美共同体,一种情感性的‘人间只在’。我们不仅生活在我们自己的时间中,而且平行地体验着我们有共同审美体验的他者的时间。”^[7]在生态创伤的语境中,作为共同体的人类社会都曾经历过掠夺环境的工业化进程,也由此构成了文明共同体的普遍性反思。换言之,生态灾难这一创伤事件虽然具备地域性与个案性,但以纪录片创作者与环境保护人士为主的呈携者群体,通过构建出典型性的创伤案例,在一次次文化操演中,完成了个案性的创伤事件,向共通性的文化痛感以及环保共识的转换,并由此形成了稳定的创伤叙事、创伤话语与创伤记忆^[8]。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创伤载体与情感中介的创伤性影像本身也具有道德和审美上的双重意义,使纪录片基于这种人类共通经验的媒介文本得以跨越不同语际,搭建起广泛的情感共识。以康德的逻辑视之,这种美与道德的情感是“愉悦”且“普遍”的:“美和道德都有净化和彻底化的主体内心状态,即不依赖于外在的、经验的任何兴趣,也基于此产生普遍的愉悦的情感。”^[7]即使这种愉悦是通过痛感而产生的,都会起到净化、同情、怜悯的作用,在主体间建立共识的可能。由此审视“生态创伤”这一议题经由相关创伤影像展开的情感通路,可以发现,相关文本往往从生命的万物有灵和自然平等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出发,通过阐述人类生存与生态破坏的创伤性经验,搭建起“创伤-痛感-共识”的传播框架,并使人类产生共通的悲悯和痛感,进而对当下人类共生和共在的问题进行积极反思。可见,强调正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创伤性影像必然携带着道德、文明乃至发展方式上的拷问,既为人类既有发展路径带来了深刻的揭露与反思,也成为跨文化传播中颇具建设性的“痛感路径”。从“创伤-痛感-共识”这一路径视之,修复自然与修复被自然重创过的社会心理是一项长期工程,几代人持之以恒的文化实践“不仅是为了重塑记忆,也为了修复一个破损的社会”。^[9]而作为中介的生态创伤影像不仅为跨文化创伤共通感的构建提供了可能,也为相应的生态实践提供了情动的潜能。

四、个体情动到命运相通:创伤共通感的情动联结与道德实践

(一)作为“联结潜能”的情动:创伤影像的二重表达

既然生态创伤的跨文化传播有赖于普遍的历史经验与自然经验,那么这种深植于文明结构中的痛感记忆如何促成跨地域的联结,成为实践中道德性与情感性的共识?哲学家阿维夏伊·玛格丽特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剖析了“伦理”“道德”与记忆的关系。玛格丽特强调,虽然民族国家仍是现阶段国际交往的核心,无偏私的人类伦理共同体并不能实现,但仍应期待将全人类转换为具备基本义务的道德共同体——“作为道德共同体的人类是否具有最低程度的分享的道德意识?记忆的事业是否应该完全留给较小的伦理共同体?”^[10]而与生态保护相关的基本义务,以及毁坏自然造成的创伤记忆,正是现阶段超越民族伦理的共识性道德,也构成了全人类理应铭记的基础准则。

在此意义上,生态创伤影像为生态共识的构建提供了一条情动(affect)路径。情动作为一个哲学概念,经由“斯宾诺莎—德勒兹—马苏米”的理论阐释与概念发展,形成了当代西方文化研究中的“情动转向”(affective turn)。作为情动研究的集大成者,法国哲学家德勒兹试图以“情动”概念去诠释如何成为“超越现有结构秩序与权力线条束缚的游牧式主体”,强调主体在构建生命图像与身份认同中

的流动性与能动性。因此,德勒兹往往将“情动”视作“潜能”,以一种乐观主义的伦理学去诠释情感对于共同体生成的重要作用:“对于一个封闭社会中的每一成员来说,如果他向情感开放,情感就传达一种回忆、一种他可以一直保持的激情。”^[11]具体而言,情动其实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我们只能认识自身,而我们对外部物体/身体的认识只能经由它们在我们自己身上所施加的情状”。^[12]因此,情动牵连起不同行动主体间的身体共鸣与情感共识,“一方从另一方中出现,又回到另一方中。情动就是从实际事物的角度出发看去的这种两面性,在其感知和认知中表达出来”。^[13]

在国别不同、形式多样的生态创伤影像中,或是沉痛言说自己所受到的自然报复,或是面向世界发自肺腑的动情呼吁,二者都致力于向受众传递创伤结构中特有的情感状态,以情催动保护自然的社会实践。例如在影片《达尔文的噩梦》中,导演于贝尔·苏佩以民族学的深描方式,记录下人为干预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的严重后果——一桶被视为能够改善坦桑尼亚社会经济的鲈鱼被投进维多利亚湖,却导致了湖内数以万计的原生鱼种灭绝。生态噩梦在坦桑尼亚上演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食物短缺、疾病横行与深度贫困等更为广泛的社会创伤。对妄图支配自然的追悔不再是坦桑尼亚人独有的,而是通过对“达尔文精神”的反诘向全世界的受众呼告与自然共存共好的迫切与必要。在情动的视野中,这些痛苦且朴素的情感状态成为情动传递的基础,生态创伤与文化共识也借此通过跨文化的情动跨越制度与意识形态的阻碍,完成由创伤向共识的潜能转换。

除了通过展示生态破坏的惨烈后果,以及人们在自然报复之后痛苦的情感,生态创伤的记录者更愿意选择一种面向未来的姿态,以理想化的情感去描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场景,去唤回人类文明对自然的依恋与相存之情。例如《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王国》在展示了普达措国家公园、祁连山国家公园等位于青藏高原的自然保护区所面临的生态恶化、动物多样性锐减的现状之后,着眼于人与自然间朴素和谐的生存关系与情感状态,去书写“如何去保护自然”而不是“为何去保护自然”,强调创伤之后融情于物、万物齐一的情感取向与实践精神。在第一集《野性的天堂》中,西藏棕熊为了度过长达6个月的冬眠不得不觅食增肥而闯入寺庙,而僧侣并不害怕这样一只庞然巨物,为棕熊准备好了饭食,隔窗静观棕熊进食的憨态,并以僧侣之口道出:“我们不伤害熊,熊就不会伤害我们。”这份相互调适、和谐共生的自然观回应了人类社会对于自然的依恋与关切,从情动这一共通感的切口出发,在跨文化的范畴中进行情感、经验与文化记忆的接续。在此意义上,文化创伤不再是“对共同体认同产生根本威胁的社会痛苦”^[1],而是向人类全体与未来社会敞开的感情结构,以表征性的媒介文本呼唤着社会实践对创伤的证成与修复。

(二)超越文明差异的道德实践:创伤影像的行动可能

无论是创伤性的告解,还是面向未来的呼吁,情动的传递往往意味着差异性的消解与统一性的转换。正如德勒兹在论及情动的生成情景时,强调情感的作用在于超越种族与生物的差异,“不是一种怜悯的情感,更不是一种同一化,而是在完全差异的个体之间所形成的速度和情感的复合,是共生”。^[14]生态创伤的跨文化传播,实质上为普遍性记忆道德与生态义务的构建,创设了弥合差异的媒介空间。而在桥接共识的意义上,文化创伤的联结需要以情动为基础的传播路径;在生态共同体构建的意义上,情动路径要求人类与自然建立起意向性的依恋之情。以《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王国》为例,虽然影片是以“国家公园”这一宏观制度着眼,但全片描摹的重点却是自然界微观的生命叙事,以此勾连起跨文化的共情体验。在旁白的引介中,解说词将“国家公园”背后的官方色彩,融会于作为个体的村民或是动物保护者的实践之中,在共同的情感叙事与意义流通中悄无声息地浸润上“生存”“哺育”“爱意”等普世的情感体验。而这一“重构叙事”“转换视角”的过程,既是在跨文化的视野中寻求交往的共性,也促成了文本普适的接受结构。书云监制也回忆立项伊始,自己与中央电视台在“科普”与“情感”上的分歧——“当初在审阅纪录片的初稿时,国内的同事和领导提出了要发挥纪录片在科普上的作用。无论是国家公园的制度,还是中国自然保护区的地理环境与珍稀动物,对于国

内外的观众来说,过量的科普存在着信息上的接受困难。更重要的是,如果科普的成分太重,就减少了感情的融入,受众对于影片的感触会变得很脆弱,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沟通上的努力。”《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王国》在150多个国家发行,并且得到了很好的反馈,这与当初以“情感”作为叙事主线,紧扣人类共通感的基础有关,不仅科普了中国多元生态环境中珍稀物种的生存和保护的现实,也传播了生态建设和动物保护中的国家叙事。

此外,痛感与创伤不仅在道德层面上为共同体间的交流提供了共识,更蕴含着转换负面情感的积极力量,通过构建出面向未来的对话结构,将创伤中的负面情感纳入集体认同与道德行动的构建之中^[10]。这一由愧疚到责任的转换,也与前文中强调的“情动”力量密不可分。言说创伤不仅是一种话语实践,更是一种情感实践。只有意识到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经历的生态伤痛与文化创伤,在跨文化的语境中进行情感、经验与文化记忆的接续,人类共同体的共识搭建才得以可能。更重要的是,创伤性影像中的情动表达蕴含着积极的“行动力量”,得以超越媒介文本与文化创伤的维度,指引着改变现实的社会实践,并在文化实践中沉积为跨文化的交往道德与记忆伦理,而这也是相关的创伤性文本或是创伤性影像促成社会实践的关键。

五、创伤共通感的跨文化路径与研究面向

结合“创伤-痛感-共识”的理论路径与《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王国》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具体实践,以“生态创伤”这一具体角度为例,笔者试图回答基于“创伤共通感”的共情理解在跨文化传播中何以可能这一问题。那么,基于创伤的传播路径是否适用于其他的跨文化议题?在当下数字化、媒介化、平台化的传播语境下,“创伤共通感”是否具备更丰富的沟通价值?这对于建构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何积极意义,在其中又有什么需要警惕与注意的方面?在这一部分,本文进一步扩展相关的问题意识与研究层次,并为创伤共通感如何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感通路提供进一步的理论想象力。

(一) 创伤共通感的议题扩展与记忆构建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创伤本身就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话语资源。无论是基于生态自然的环境破坏,还是生发于人类悲剧与意外事故的文化事件,这些特定国族与共同体所面对的创伤不仅是区域性(regional)的构成,也是人类文明需要一起面对的“记忆事件”(memory event)。创伤不是居于一时一地固定不变的沉痛体验,而是如文化记忆学者阿斯特莉特·埃尔所描述的,是一种在文化交往中不断旅行(traveling)的记忆实践^[15]。在埃尔看来,跨文化记忆本就根植于我们普遍的日常经验,例如许多包含民族痛感的历史故事就在迁徙与沟通的过程中成为不同文明所共有的传说或故事。从媒介研究的视角来看,作为记忆载体的媒介具备去地域化的功能,记忆的内容也多是文明主体所能共享的图像与话语。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媒介文本所承载的创伤记忆不仅是特定文明的文化烙印,也是生产共识与促进合作的交往场域。将既有的文化创伤推介出去,成为世界文明发展历程中普遍现象的特定表征,这不仅是“世界记忆”(cosmopolitan memory)时代的文化特点,也为我国的国际传播提供新的指引。正如笔者对《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王国》的监制书云进行访谈时,书云也强调了生态题材与环保影片在国外的受欢迎程度:

现在《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王国》的已经发行到了150多个国家,这可能是中国纪录片对外发行比较好的成绩了。在美国的野生动物栏目中,我们的片子是自制影片中收视率最好的,而且要比一般的收视率要高出13%。这就给了我很多启发,例如《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王国》的宣传是抓住了动物的萌,但重心其实在于如何通过建立国家公园这一制度挽回饱受破坏的自然环境,对于中国与世界的对话而言,这种生态文明建设与宣传是更为重要的。

换言之,无论是在主观的认知与交往上,还是在客观的技术与传播上,人类普遍的痛感经验都

具备跨文化传播的可能。从自然生态的破坏到亲人朋友的流离失所,与之相关的痛感议题皆蕴含着巨大的传播势能。

(二) 作为情感基础设施的数字平台与图式化传播

关注痛感带来的跨文化连接可能之时,作为传播基础设施的平台媒介在“接续情感,构建共识”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也不能忽略。这一作用首先体现作为共识基础的“创伤记忆”在网络平台中呈现出高度流通的样态,人们对记忆资源的阐释与传播也愈发及时与积极。霍斯金斯以“连接性转向”(connective turn)描述数字时代的记忆特质与流动方式发生的微妙变革:“在当前的记忆生态中,连接性转向导致记忆变成事件媒介化过程中结构性的一环。这一结构化过程将两种关键的、彼此关联的记忆力量结合在一起,一是数字当下的纪念化,二是不安全感导致的对过去的记忆需求。”^[16]前者强调数字媒介与平台媒体使事件发展与纪念活动出现某种时空上的同步性,例如“马航失联”这一悲剧事件不仅在国内的社交平台上引发剧烈的悲痛情绪,在诸多国际网站上也不乏哀悼的声音。联结世界的社交网络使特定地区的创伤事件具备了“跨地区”的可见性,也由此带来了情感联结与构建共识的可能。此外,由于信息环境的变化,创伤事件的迅速流通也带来了集体的不安情绪,“使得人们渴望回首过去,不停地把它翻来翻去,寄望于找到少许延续性和稳定性。”^[16]霍斯金斯将这一“联结历史事件”的记忆实践视作“图式化”(schematization)的过程,当下的数字环境要求即刻发生的事件可以迅速转换为便于传播的新闻模态,对既有记忆资源的挪用也由此成为资讯生产的惯有手段。例如,在动物保护行动中反复播放《海豚湾》以凝聚最大共识,援引皇后乐队(Queen)在“拯救生命”援助非洲慈善演唱会中的经典片段表达“天下一家”的共同体认同……这些图式在巩固旧有记忆轨迹的同时,也提供了建构跨文化共通感的媒介资源。特别是在平台化与媒介化深度演进的当下,如何借用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创伤资源与记忆话语,使“中国故事”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在国际传播中具备朴素的情感力量也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三) 跨文化语境中的“情感腐蚀”现象及其反思

需要注意的是,创伤与痛感在建构跨文化共识与共情理解的同时,也存在因负面情绪瓦解沟通基础的“情感腐蚀”现象。特别是在气候变暖、海洋保护、重大卫生事件等跨国议题上,对同胞遭受苦难的共情、对生态灾难的痛心往往会沦为国家间权力博弈的舆论工具,在归因溯源、推诿指责中用“怨恨”代替“共识”,逐渐腐蚀了跨文化沟通的理性基础。例如,面对愈发严重的极地气候与生态危机,相关的国际合作却往往受到历史遗留问题、国际多边关系等问题的掣肘,致使跨国族、跨文化的负面情绪不断发酵,进一步搁置了改善极地生态的对话与实践。

诚然,“怨恨”等负面情绪作为人类个体乃至社会共同体普遍的情绪,在日常的人际传播或是国际交往中确实难以规避。但需要明确的是,跨文化的视野及方法也同样提供了将“痛感”转换为建设性“创伤共通感”的可能,使负面情感得以超越怨恨与指责的内在向度,促成共同体间共识的搭建与实践的付诸。要应对“情感腐蚀”这一负面因素,首先要认识到既有新闻话语与沟通话语中隐含的“他者化问题”,进而去思考跨文化的认同构建。换言之,对于跨国议题的争议及其所牵涉的负面情感,在新闻文本中往往呈现为“我们”与“他者”的尖锐对立,“这种以‘保卫我们的民族’‘保卫我们的生活’为目的的‘亲友种族主义’(kith and kin racism),刺激并呼应着人们的惧外心理”^[17],在构建单一认同感的同时却也阻碍了更进一步的共同体合作。因此,在警惕积郁、仇恨等负面情感有可能“腐蚀”跨文化共识与基础的同时,也应该反思是否能发展出一套“反抗他者化”的跨文化话语,进而实现更具建设性的复合共同体认同(multi-community identity)。诚如单波教授所言:“对他者化的抵抗并不只是抵抗权力,更重要的是抵抗每一个文化群体成员心中的排他性认同。对他者化的抵抗也并不只是站在道义层面保护他者,更重要的是保护人类的交流,没有对他者化的抵抗,人类的交流亦难以为继。”^[17]

六、结语

以共情、正义、体恤为代表的人类朴素情感,通过创伤呈携者或是新闻媒体的报道,为跨语际的认同提供了可能。实现痛感与共情传播的可能在于普适性的情感,情感必须经由特定事件作为载体与中介才能激发,而创伤性事件及创伤性体验恰恰编织出了“生命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路,这要求去挖掘不同新闻议题中的共识性创伤,从文明的创伤性经验入手,形成跨文化的连接通路,为官方与民间的生态合作建起沟通的话语桥梁。正如中国积极向外界展示自身在保护云南北迁象群与西双版纳大象栖息地的努力,被路透社称赞并与更为宏观的健康风险相联系:“西双版纳如何保护大象和自然生态系统,也将为中国改变与自然关系的整体努力定下基调”^[18],展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生命共同体”的全球性及不可分割性。

而在跨文化的视角中,创伤与痛感所建构的共识理路不仅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契机,也为生命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提供了话语基础。列维与施奈德认为全球媒体的呈现为全球记忆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认识论支点(epistemological vantage points)与和新的道德-政治互赖关系(moral-political interdependencies)^[19],这一变化既可以体现在共同体看待生态环境等跨文化议题的态度转变上,也可见诸跨区域与跨文明的合作之中。这对我国的国际传播工作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如何在普适性的记忆题材或创伤话语中发掘出中国故事,在文化创伤上寻求跨文化的交往共识与合作可能,也由此成为至关重要的跨文化命题。

参考文献:

- [1] J. C. Alexander. *Trauma: A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6; 6; 13; 13-15; 43-55; 15.
- [2] J. Herman. *Trauma and Recovery: 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33; 51.
- [3] T. Amorok. *The Eco-Trauma and Eco-Recovery of Being. Shift: At the Frontiers of Consciousness*, 2007, 15: 28-31.
- [4] A. Narine. *Eco-Trauma Cinema* (1st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9; 2; 2.
- [5] 郭恩强. “以新闻而生,以新闻而死,为新闻殉节”——刘煜生案与“九·一”记者节的创伤记忆叙事. *国际新闻界*, 2019, 9: 84-104.
- [6] 杰弗里·C·亚历山大,生安锋,林峰. 文化创伤:一种社会理论——与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的访谈. *文化研究*, 2021, 2: 5-28.
- [7] 周黄正蜜. 康德共通感理论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124; 125; 127; 127.
- [8] 王建会. 文化创伤操演与创伤话语建构. *文艺理论研究*, 2017, 2: 155-161.
- [9] 桥本明子. 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 李鹏程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 6.
- [10] A. Margalit. *The Ethics of Memo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77-78; 159-169.
- [11] 吉尔·德勒兹. 康德与柏格森解读. 张宇凌,群德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04.
- [12] B. Massumi. *The Autonomy of Affect*. *Cultural Critique*, 1995, 31: 83-109.
- [13] G. Deleuzes. *Lecture Transcripts on Spinoza's Concept of Affect*//刘芊玥. “情动”理论的谱系. *文艺理论研究*, 2018, 6: 206.
- [14] 吉尔·德勒兹. 哲学与权力的谈判. 刘汉全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179.
- [15] A. Erll.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trans) Cultural Memory*. *Asia Europe Journal*, 2010, 8: 305-315.
- [16] 安德鲁·霍金斯,李红涛. 连结性转向之后的媒介、战争与记忆. *探索与争鸣*, 2015, 7: 106-144.
- [17] 单波,张腾方. 跨文化传播视野中的他者化难题. *学术研究*, 2016, 6: 39-45+73+2.
- [18] S. David. *China's Wild Elephants Seek Room to Roam as Habitats Shrink*. Reuters. 2021-07-20. [2022. 07. 01]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chinas-wild-elephants-seek-room-roam-habitats-shrink-2021-07-20/>.
- [19] D. Levy, N. Sznajder. *Memory Unbound: The Holocaust and the Formation of Cosmopolitan Memor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2002, 5(1): 87-106.

Pain and Consensus: A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uma Common Sense: An Analysis Based on Ecological Trauma Images

Wang Xin (Tongji University)

Huang Haoyu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From the continuous acid rain that enveloped Manchester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ecological documentary *The Cove*, which has stirred up a global animal conservation movement since its release, the ecological trauma caused by humans and its tragic consequences is not only represented in cross-cultural, cross-generational and cross-media texts, but also through the common "pain" and "trauma" among communities to build an empirical consensus and emotional connection on "how to live with nature", and re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specific ecological trauma to universal cultural trauma. Among them, as the emotional mediators, how can ecological trauma images construct empathetic understanding between heterogeneous civiliz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provide more possibilities for human communication? Based on such problem awareness and theoretical suggesti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rauma-pain-consensus" can be built from the ideological genealogy of common sense and trauma memory to explain how the creation process and communication practice of "trauma text" achieve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how the interviews with documentary filmmakers and audiovisual analysis be combined. Finally, this paper discussed how the social practices inspired by trauma common sense lead to a universal identity from the community of life to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of Mankind.

Key words: keenly pain; consensu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ultural trauma; community of life

■ 收稿日期: 2022-11-22

■ 作者单位: 王 鑫, 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上海 201804

黄皓宇,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 责任编辑: 刘金波